

绪 论

在陕西的历史上，隋唐时代应是它最为辉煌的阶段，也是它由全国中心衰变为地区中心的历史大转折时期。

被日本学者誉为“世界帝国”的隋唐王朝，为关陇胡汉贵族军事集团（简称关陇集团）所创建。今陕西地区之所以能在隋唐时达到辉煌，则基于西魏、北周以来的关陇集团长期奉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。

关陇集团是以入关的北魏六镇鲜卑贵族为主体，联合关陇地区的高门望族和其他入关的胡汉大姓，结成的稳固的军事集团。所谓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是指创建关陇集团的宇文泰制定的以经营关中为根本，以居重驭轻、宰制全国为目的的基本国策。宇文泰以“关中本位政策”创建霸业，“隋唐因之，遂混一中国，为极盛之世”。^①由此可知，贯彻“关中本位政策”乃是关陇集团的最基本的特征，亦是隋唐时的今陕

^①陈寅恪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 2 月版）。

西之所以能居于全国政治、文化乃至经济的中心地位的主要原因。下边且就西魏北周以来特别是隋朝、唐初的关陇集团的领袖们推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。

其一,入关的胡汉贵族‘改称京兆人’,或‘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’。

北魏末年,出身于六镇之一武川镇(今内蒙古武川县西)军人的鲜卑贵族宇文泰等入关,仅数年时间就成气候,拥北魏皇室余孽元宝炬称帝长安,史称西魏。西魏时期(公元534—556年),宇文泰制定并贯彻‘关中本位政策’,他除了笼络当地汉人(如武功苏绰等)进行“托古改制”即汉化改革外,还创立府兵制,形成以六镇军人为主体的关陇集团,使本来相对落后的关陇地区,成为能同东魏、南梁抗衡的实力。至其长子北周明帝(即宇文毓)时,为进一步增强关中的地位,在他即位的第二年(公元558年),特地下诏书说:“三十六国、九十九姓,自魏南徙,皆称河南人,今周室既都关中,宜改称京兆人。”^①这就是说,继北魏孝文帝时改“五胡”等民族的贵族为洛阳籍贯之后,至此又一律改为长安籍贯。诏书中未提入关汉人改地望的事,当因此前这一问题早已解决。《隋书》卷33《经籍志二》称:“及周太祖入关,诸姓子孙有功者,并令为其宗长,仍撰谱录,纪其所承。又以关内诸

^① 《北史·周本纪上》。

州，为其本望。”说明一些汉族入关士人，早在西魏时，就已改以关内诸州为其本望。祖上“世居武川”的杨隋、李唐分别以“弘农华阴”和“陇西成纪”为郡望，当改于这时候。

其二，以婚姻为纽带，增强关陇集团上层的凝聚力。

为在婚姻关系上体现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精神，关陇集团的上层，尤其是领袖们，结成长达百余年的排他性婚姻圈子。如武川镇军人出身的柱国大将军独孤信的长女被北周明帝册为皇后，第四女嫁给也是“八柱国”的李昀（即李渊的父亲）为妻，隋朝的开国君主杨坚则以独孤信的第七女为皇后。杨坚同独孤后所生长女杨丽华，入宫为北周宣帝皇后。李昀与独孤氏所生长子李渊，则娶北周武帝的外甥女窦氏为妻。窦氏为柱国大将军窦毅第二女，窦毅尚宇文泰第五女襄阳公主。这种关陇集团圈子内的政治联姻，一直延续到盛唐。如京兆韦氏，出皇后 1 人，驸马 5 人，王妃 1 人 华阴杨氏，出皇妃 1 人，驸马 5 人，王妃 3 人 扶风窦氏，出皇后、皇妃、王妃各 1 人，驸马 7 人；定居长安的李渊元从功臣武氏，出皇后（后为女皇）、皇妃各 1 人，驸马 5 人；长安长孙氏，出皇后 1 人，驸马 4 人。此外，北周的皇后，还至少有 3 人来自西魏宗室元氏（与唐长孙皇后同祖）。以上表明，尽管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的王朝更替频繁，但 4 个王朝都来自关中婚姻集团的圈子。

其三，以关中为根据地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。

宇文泰经过 20 多年的对关中的苦心经营，使关中实力由弱骤强，为北周统一北方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。到北周武帝（宇文泰第四子宇文邕）时，又通过在关中推行“求兵于僧众之间，取地于塔庙之下”的“灭佛”等措施，进一步增强了北周的国力，遂于公元 557 年灭掉北齐，统一了北中国。隋文帝杨坚登基后，又采取了旨在发展关中地位的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，终于使以长安为中心的隋朝国力大大超过以建康（今南京）为中心的南方陈朝的国力。公元 589 年，隋军一举灭陈，结束了自西晋以来的长达 270 余年的国家分裂局面。隋朝末年，天下分崩，众望所归的关陇集团新的领袖李渊起兵太原，长驱关中。李渊回到久违的故土，如鱼得水，不仅受到旧部戚党的欢迎，连当地的农民军也竭诚送款。李渊进入长安后，宣布约法 12 条，取消隋二世苛法暴政。建立唐朝后，又规定租庸调法，扫除隋炀帝的横征暴敛，且首开言路，网罗人才，扩大统治基础。建唐初年，他虽然只据有关中和河东地区，但不久就扫除割据今甘肃的薛举、李轨和今山西朔州的刘武周等势力，巩固了李唐政权的根据地。接着又对关东用兵：武德四年（621 年）擒窦建德，降王世充；五年破斩窦建德余部刘黑闥，不到 6 年就削平群雄，完成了国家的早期统一战争。贞观四年（630 年）起，唐太宗又北灭突厥，西讨吐谷浑、高昌，开始了大统一战争，后经唐高宗的继续努力，终于建成疆域超越秦汉的蕃汉

一统的国家。这些统一事业，若没有关中大本营提供人力、物力乃至精神上的支持，是绝不能完成的。

其四。在军力布署上采取关内外有别，内重外轻、居重驭轻的战略方针。

关陇集团是凭借武力建立起来的胡汉贵族军事集团，因此这个集团的“关中本位”的思想和政策主要表现于兵力布署上的“居重驭轻”方面。当初宇文泰等入关时所统兵种基本上为六镇鲜卑部落兵，人数在万人左右，若以此兵力据守关中并与关东、南梁抗衡，显然不太可能。因此，他大力进行兵制的改革，创立府兵制。宇文泰参照鲜卑部落的“八部”兵制，陆续设置八个柱国大将军。又仿西周天子六军之制，以勇决习战的六镇兵为基础，并广募关陇豪右，设置 6 军，让八柱国中的 6 位分统 6 军。6 军之下又分 12 军，设 12 大将军。12 军下再分 24 军，设 24 开府将军。24 军下又分 48 军，设 48 仪同将军。每个仪同将军各领兵 1000 人左右，总有 5 万兵。为了扩充兵数，还将关中等处“乡兵”并入，如京兆韦瑱、武功苏椿等各自所领乡兵都纳入西魏兵力系统。为增强关中兵力，还把其他地方军队移为关内兵。如北周建德六年（577 年），一次就迁徙并州（今山西太原西南）军人 4 万户于关中。西魏、北周的府兵，实行兵民分籍管理的制度，所以在北周武帝时，于渭河中上游流域筑武功（在今武功县境）、郿斜谷（在今眉县西南）等城，以置军人。而统兵的将领

全部为关陇人士（特别是落籍长安的六镇军人）。如《周书·侯莫陈崇传》卷末附有八柱国名单，8 人中的宇文泰、李虎（李渊祖父）、独孤信、赵贵、侯莫陈崇，均世居武川，即源出六镇的入关的胡汉军人，另 3 人元欣出自入关的北魏宗室，李弼来自入关的慕容鲜卑，于谨则为宇文泰的嫡系亲信。这些人中，除李虎、赵贵有可能是鲜卑化的汉人，其他全为鲜卑人或鲜卑化的胡人。八柱国之下的元赞、元育、元廓、宇文导、侯莫陈顺、达奚武、李远、豆卢宁、宇文贵、贺兰祥、杨忠（杨坚父）、王雄等 12 大将军，不论是出自魏室、武川或其他，不论是胡人或胡化汉人，无不在关中落籍。这些西魏、北周的军事和政治领袖，加上其下的也是关中人的 24 开府将军、48 仪同将军，共同构成关陇贵族军事集团。隋承周制，继续推行以关中为本位的府兵制。为了使军府的设置常保“重首轻足”的特征，隋文帝特于灭陈后的第二年（590 年）下诏“罢山东、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”。5 年后，又下令收天下兵器，“敢私造者坐之”，但却重申“关中、缘边不在其例”^①。虽然隋朝因国家统一而在关外各地也设置不少军府，但府兵均称“卫士”，卫士的主要任务是轮番入关到京城宿卫，且兵权集中在天子手里，12 卫（按：十二军改）大将军平时又多住在京城，依然是内重外轻、居重驭轻的形势。

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 178《文帝开皇十五年二月丙辰》

唐朝建立后，在兵制方面的内重外轻的情形更加完善。如武德二年（619年），唐高祖分关中为12道，置12军，12道下列置军府，分隶于12军。其军将、军副、骠骑将军、车骑将军，均由关陇集团军人或李渊太原起兵元从担任。到了贞观十年（636年），唐太宗为适应国家大统一的形势，又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府兵制。时全国划为10道，每道置军府多少不等，10道共置军府（即折冲府）600左右，而关内道就有274，几乎占军府总数的一半。又，关内道的长安所在的京兆郡竟置131府，占全国总数的1/5。再，全国军府又分隶于中央的12卫和东宫六率，轮番宿卫京师，称为禁卫军，也就是说全国军队都要以卫戍关中、警卫宫禁为第一任务。这种“重首轻足”、“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”、“举天下不敌关中”的兵力部署，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唐初统治者是如何的重视国家心脏所在的关中。

其五，关中在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确立和巩固。

公元589年，隋文帝结束了国家长期分裂南北分治的局面，继西周、秦、汉之后，长安再次成为统一国家的首都，关中重又确立为全国的政治中心。然而，关中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的巩固，又必须具备如下几个条件：最高统治者是否能够通过加强中央集权继续贯彻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；随着全国经济重心的东移南去，统治者能否解决关中官民的吃饭问题；关中的文化状况如何，是否居于全国领先地位；在军事

上能否控驭四方。关于后者，因隋朝、唐初推行府兵制，“举天下不敌关中”，这前文已说，而其他几个条件也都基本上具备。

隋唐创业人都十分重视中央集权制度的建设。隋文帝鉴于西魏北周宰相权力过于集中（如西魏宰臣宇文泰集军政大权于一身，由之引出了北周代西魏。而杨坚本人亦以大丞相代周称帝），遂析相权为三：内史省长官内史令掌草拟政令，门下省长官纳言掌政令审核，尚书省长官尚书令掌政令执行。尚书省下又设六部，六部长官分掌全国官吏选拔考核、礼仪、军政、刑法、户口钱谷、营建等事务。三省长官都是宰相，各对皇帝负责。由是皇权即中央集权大大加强。此外，隋文帝又根据‘存要去闲，并小为大’的原则，改地方州、郡、县三级为州、县两级，并对九品以上的地方官，规定了由中央任免、考核的制度。地方行政机构的简化和地方官员任免权集中于中央，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。自后不仅改变了魏晋以来“民少官多，十羊九牧”的现象，且沉重打击了地方豪强的势力，“海内一命以上之官，州郡无复辟署矣”^①。隋朝还废除了数百年来的按门第高低选用官吏的九品中正制，创立科举制，用考试的办法选拔人才。原来设有‘秀才’‘明经’两科，隋炀帝又增设‘进士科’。把录取和任用权完全

^① 《隋书》卷 46《杨尚希传》；《通典》卷 14《选举六》。

集中于中央，既限制了门阀士族对选举的把持，又为庶族地主参政开辟了途径。此外，隋朝还在统一货币度量衡，兴修水利交通，修订隋律，建造新都大兴城，搜刮户口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辅助措施。中央在长安，长安在关中，中央集权的加强，关中国家政治中心地位也就随之巩固。从长治久安考虑，出身于关陇集团的隋唐最高统治者，还特别重视关中官民的粮食供应问题。首先，他们曾在关中大力推行均田制。由于府兵制在隋唐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之上，那么只有在“均田”中得到好处的农民才有能力自备行装、器械去充任府兵。既然隋唐时的关中军府设置最多，那就足以证明均田制曾在关中认真推行。隋和唐初的关中地区阶级矛盾较为缓和，说明当地的自耕农人数一定可观。所以在正常年景下，他们的衣食有基本上的保证。隋末的农民起义主要发生于山东河北和江淮，更反证炀帝的横征暴敛，对关中是个例外；为保证兵源，府兵免“租调”的权利，即便暴君也不敢轻易破坏。关中民众相对安定的物质生活，正是这个地区成为全国中心的基本条件。其次，为了养活关中人口，统治者十分关注漕运建设。隋文帝即位之初，就诏令西起蒲（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）、陕（今河南三门峡市），东至卫（今河南汲县西南）、汴（今河南开封市）等 13 州募丁运米，以供京师粮食无缺。又在京城设太仓，华州（今华阴）置广通仓，陕州置常平仓，洛州（治今洛阳）置河阳仓（在

今河南孟县南），卫州置黎阳仓（在今河南浚县西南），从而通过漕运“转相灌注”，达到将“关东及汾晋之粟”^①以给京师^①的最终目的。后来关中大旱，文帝曾发广通仓储粟 300 多万石，赈济灾民。特别有意义的是，隋文帝命大臣宇文恺组织民众开凿广通渠。此渠引渭水经大兴城（后改称长安）东至潼关，全长 150 余公里，自公元 584 年动工，历时 5 年完成。广通渠避免了渭水船运经常搁浅的弊端，使“转运通利，关内赖之”。后来此渠又以支脉同炀帝时开凿的大运河连接起来，从而解决了南粮北运、东粮西调的问题，京师官民不再为吃饭问题大伤脑筋，关中的全国政治中心地位也就愈益巩固。至于关中文化，在当时的全国甚至亚洲，都具有绝对优势。关中自魏晋南北朝以来，由于多民族杂居，一直为胡汉文化交融的中心和民族大融合的熔炉，其文化具有杂交的优势，非其他地区所可比拟。这首先反映在关陇集团领袖们的“华夷无猜”的文化思想上。像关陇集团的创始人鲜卑贵族宇文泰及其子孙，一方面继承了其胡人的某些固有文化，另一方面又从汉族的古老文化周礼中寻求“托古改制”的依据；像关陇集团的末代领袖唐太宗李世民虽自谓为汉人望族“陇西李氏”出身，可是在思想上却具有“自古皆贵中华，朕独爱之如一”的文化心理。这种先进的民族思想，

① 《通典》卷 10《食货十·漕运》。

使得关陇集团中的汉人很少歧视胡人，而胡人更不歧视汉人。他们不仅在婚姻上互以对方为对象，更在文化上互相吸收、取长补短，共创先进的关中文化。其次，关中文化的先进性还反映在隋唐对北朝以后的外族、外域文化的兼收并蓄上。如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东突厥降唐，除安置突厥可汗、特勤（即王子）等定居长安并给予高官厚禄外，其余酋长至者，“皆拜将军中郎将，布列朝廷，五品以上百余人，殆与朝士相半，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”^①。按，贞观初年中央文武百官，总共只有 640 员，而贞观四年仅突厥一族在朝任高级武官者，就占朝廷全部官员数的 $\frac{1}{6}$ 和文武大员 $\frac{1}{2}$ 。又，唐初的京师人口，充其量不过 8 万户，而仅突厥民族入居者，就占有长安总户口的 $\frac{1}{8}$ 。此后，铁勒、西突厥、昭武九姓胡、靺鞨、“两蕃”、吐谷浑、党项、吐蕃、诸蛮、高丽、新罗，以至波斯、大食、日本、印度的入侍王子、首领、使人、客商、僧侣、留学生、民间艺人、一般游客，都有数字可观的落户长安者，后来长安之所以发展为人口百万、多民族的国际大都会，大量蕃人人居，应为主要因素之一。在这种胡汉杂处的氛围下，长安居民，不分上下，大都雅爱胡风蕃俗，从衣食住行用，到音乐、美术、舞蹈、体育、百戏等精神生活，无不有胡化或胡汉文化交融的韵味。如唐太宗早年热衷于同突厥大

^① 《资治通鉴》卷 193 《贞观四年五月丁丑》。

贵族结‘香火’兄弟,既为汉人天子,复又‘下行可汗事’。其长子承乾好胡歌、胡舞、胡语、胡服、胡居、胡食、胡髻、胡友,自云最大的愿望是“解发为突厥”。由于统治者不但不排斥还虚怀接受外来文明,高雅的宫廷乐——十部乐中,至少有八部来自蕃人;宗教文化中,包括遍布京师和关中其他各地的寺院建筑,壁画、雕塑、宗教仪式、经典教义、宗教音乐等等,都具有中外交融的风格。至于饮食、服饰、婚丧、礼仪等关中人社会生活,由于‘五方错杂’,更是‘风俗不一’。在关中地区包容外来文化的同时,亦通过学校、科举等手段搜罗全国人才和促进蕃人的汉化。唐代的学校,最称发达的是在京师长安。唐代中央设有国子监,国子监领导国子、太学、四门、律学、书学、算学等六大国立学校。这些学校主要招收贵族子弟,也接纳羁縻府州和属国蕃人君长的子弟。据《旧唐书·儒学传序》载,为了到京城求学,唐太宗时的“四方儒士”“多抱负典籍,云会京师”。连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等国酋长,也遣送子弟“入于国学之内”;蕃汉各民族的学生仅在最高学府国子学读书习儒者,就达 8000 余人;“儒学之盛,古昔未之有也”。通过学习儒家经典和其他途径如与汉人联姻等,在京的蕃人大都汉化。如定居长安并尚临洮县主的铁勒酋长契苾何力,在京仅数年时间,就已具有良好的汉文学修养。其子契苾明更了不得,碑称明“学该流略,文超

贾马”；乃人物之仪表，实衣冠之领袖’^① 出身昭武九姓的凉州（今甘肃武威）胡人安兴贵、安修仁兄弟，于唐高祖武德初年以平李轨功官拜大将军，其后人“或徙京华，习文儒，与士人通婚者，稍染士风”。至于以后落籍长安的蕃人名将，如西突厥哥舒翰、吐蕃论弓仁、契丹李光弼、铁勒浑瑊等等，其本人其后裔，无不熟读汉人典籍，无不彻底汉化。唐人重视科举入仕，因此全国的文化人，大都向往“雁塔题名”和“曲江大会”。为了博得一官，各地的举子麇集京城应试。当唐太宗看到新中进士在榜下接连走出时，对待臣高兴地说：“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”。这样，最受皇帝欣赏的精英，当然要留在朝内做官。而这些高层次的文人，还有那些名落孙山、怀才不遇而流落京城或附近的人，又经常会给关中文化补充新的因素。所以，关中文化既吸收有各民族甚至域外文化的成分，亦综合有中国各地汉文化的基因。从而使关中文化成为隋唐最优秀最先进的文化，使关中处于国家文化的中心。

总的来说，由于远自西魏、北周时当政的关陇集团就制定和推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又经隋唐创业人不遗余力地贯彻，所以隋唐前期的今陕西地区呈现政治安定、经济繁荣、文化先进、人口稠密的兴旺发达景象。

^① 《全唐文》卷 189《契苾明碑》。

但这种陕西古代史上最好的时期，既中间有过某些曲折，复不能一贯到底。这是由于一些统治者背离了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必然结果。

隋二世时就曾出现过第一次重大曲折。

仁寿四年（604年），隋炀帝一即帝位就下令营建东都，三个月后，就迁居洛阳。席不暇暖，又于次年行幸江都（今江苏扬州市）。大业二年（606年）四月返回洛阳。三年三月西归长安仅1个月，就又北巡。5个月后还至东都。又经太原幸汾阳宫（在今山西宁武县西南），巡长城，东至恒山。五年正月，又西巡张掖（在今甘肃）。九月，回到西京。十一月，复还洛阳。六年三月，幸江都。七年二月，北巡涿郡（今河北涿县）。八年，攻高丽，九月，回东都。九年三月，幸辽东（今辽宁新民县东北），二伐高丽，九月，撤回博陵（今河北定县）。十年三月，复至涿郡，三征高丽，七月，往辽西（今辽宁义县东南），十月经东都还长安，十二月东去洛阳。十一年五月，北巡，被突厥围于雁门（今山西代县），十月，回东都。十二年七月至十四年三月被弑时，一直待在江都。炀帝在位时间，共14年又8个月，待在长安的时间不足1年，在洛阳4年左右，两次北巡、一次西巡和三征高丽5年多，其他数年则在远离关中政治军事中心的江都。

隋炀帝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性大错误。前边讲过自西魏以来，最高统治者一直奉行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他们视关中

为根本，因此长期精心经营，建立了巩固的大本营。尤其是隋文帝在关中全面推行均田制，并把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。“寓兵于农”的府兵“三时耕稼”“一时治武”，基本上不脱离农业生产。“隋氏之盛，实由于斯”。^①可是因隋炀帝数巡西北、三征高丽、久幸江都，背离“关中本位政策”，特别是主要由关中府兵组成的禁卫军，由于远离故土，长久不能归农，在思归心切而却难以如愿的情况下，部分人侥幸自江都逃归，多数则被有野心的禁军将领利用。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三月，炀帝的亲信，禁军头领宇文化及利用禁军将士思家情绪，发动兵变，弑炀帝于江都宫中。

炀帝之死和隋朝的寿终正寝，从一定意义上讲，是由于炀帝远离了国家的政治中心，背离“关中本位政策”。

第二次曲折是发生武周政权时期。

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，原非关陇集团出身，因追隋李渊而成为唐朝开国功臣。李渊为了奖拔他，就介绍他同隋朝宗室弘农杨氏联姻，因此武士彟这个原为山西木材商出身的新贵，可以勉强算作关陇集团圈内的人。因他根底太浅，所以其女儿在被册皇后时，受到关陇集团中以长孙无忌为首的重臣们反对。后来武则天当政，就大开杀戒，诛除许多出身于关陇集团的政敌。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政治影响，在其

^① 《玉海·兵志》引《邺侯家传》；《通典》卷5《食货》。

被册为皇后后，就鼓动唐高宗长期到洛阳居住。在她称帝后，就把洛阳称为神都，定为全国政治中心，15 年女皇生涯，全部时间都住在洛阳。这当然是对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背叛。唐初的军府主要集中于关中，武周政权既远离兵源所在，也就失去了居重驭轻的优势。姑且不讲武则天的政绩，其统治时期的军事情况实在不妙。首先是东突厥 24 州同时叛变，因武则天无强大兵力平叛，结果在贞观、永徽中以东突厥降户所置羁縻府州尽失，崛起了同武周对抗的后突厥汗国。接着，在营州（今辽宁朝阳市）一带的契丹民族，因不堪武周的地方官营州都督的压迫，也揭竿而起，契丹军一度打到河北地区。武则天数派大军镇压，或大败，或全军覆没，贞观时在东北地区以“两蕃”（契丹和奚）等民族建立的羁縻府州也被迫放弃。此外，唐初在西域的经营成果，武周时也丢掉不少。武则天时期的边防吃紧，国家军队屡战屡败，一方面说明女皇的民族政策大有问题，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武则天因背叛“关中本位政策”而导致国力明显削弱。

公元 705 年，宰相张柬之等在洛阳发动宫廷政变，逼迫武则天传位中宗李显，同年女皇驾崩。不久，中宗率百官返回长安，关中再次成为全国政治中心。唐玄宗励精图治，出现“开元盛世”景象。但“盛世”很快衰落下去，其中重要原因，是‘关中本位政策’无法贯彻下去。

早在武则天时代，由于地主官僚兼并土地，均田法就很

难继续推行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就面临瓦解危机，加之府兵社会地位太低，如同厮养，兵士逃匿的现象也日趋严重。这种情况到了玄宗天宝年间，随着均田制崩溃，自耕农失去生计被迫逃亡，军府也就“无兵可交”，朝廷只好以募兵制替代。募兵制下的官兵关系截然不同于府兵，府兵制下的将领只有战时才有统兵权。战事结束，将帅回朝，兵士回乡从事生产与进行平时操练，官兵之间不太容易形成紧密的隶属关系。募兵制则是职业兵制，将帅长期统率募兵，形成兵不离将的关系，故募兵制是产生军阀的温床，是军阀割据的根源。玄宗晚年，好大喜功，为穷兵黩武，于边地设 10 道节度使，蕃将安禄山一人就兼范阳（今北京西南）、平卢（今辽宁朝阳市）、河东（今山西永济市蒲州镇）三道节度使，拥有全国总兵力的 $\frac{1}{3}$ 以上，几占边兵的 40%。时全国兵总数的 57 万余人，边兵 49 万，减去边兵，内地（包括关中）只乘 8 万多兵，关中驻军更远少于 8 万。唐初是“举天下不敌关中”，天宝时，则是本末倒置，居轻驭重，举天下不敌一镇。地方军阀的崛起，中央同地方力量对比严重失衡，遂导致“安史之乱”的发生，唐朝遂由之进入衰落的后期。

随着“关中本位政策”的抛弃，唐朝后期的形势也就每况愈下。好不容易求助于回纥兵平定了安史之乱，喘息未定，又出现了安史余孽在河朔的割据。更糟的是，平叛功臣